

湘學研究

二〇一四年第二輯（總第四輯）

• 湖南省湘學研究院 主辦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W. A. A. A.

W. A. A. A.

W. A. A. A.

W. A. A. A.

湘學研究

二〇一四年第二輯（總第四輯）

• 湖南省湘學研究院 主辦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学研究：2014年第2辑(总第4辑)/湖南省湘学研究院主办.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161-5448-9

I. ①湘… II. ①湖…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湖南省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1130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茵
责任校对 任晓晓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16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34千字
定价 4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湘学研究》总第四辑目录

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关于群众路线的几点认识 田培炎 (1)

《濂溪志》与当代社会人文精神简析 王晚霞 (7)

湖湘学派对周敦颐的推尊考论

——以南宋时期濂溪祠记为中心 陈安民 周 欣 (16)

湘学与道南

——周敦颐对道南的影响 朱雪芳 (26)

“心统性情”与“正心澄心”

——王夫之对“心性”概念的辨析及其修养实践思想 陈力祥 (33)

性日生而日成

——王夫之心性论发微 李万进 (42)

王夫之《莲峰志》补证、发微 周建刚 (58)

明代万历年间颁赐南岳方广寺大藏经考

——兼论明代高僧紫柏真可禅师与方广寺的因缘 刘范弟 (74)

宋代湖湘学派与佛道二教的交涉 刘立夫 (85)

论晚明心学对南岳禅学的继承和发展 傅秋涛 (93)

宋代著名文士与南岳方广寺 陈靖华 刘 涛 (108)

辨证遇夫训诂，弘扬湖湘学术

——《杨树达训诂研究》序言 杨逢彬 (121)

试论杨树达的训诂成就和局限 卞仁海 (131)

湖湘文化对近代以来湖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吴志国 (140)

湖南美术的“源”与“流” 朱仁夫 (152)

镜头下的湖湘文化精神

——评电影《辛亥元勋》 汪 苏 (158)

道光《洞庭湖志》

——18 世纪政界、知识界对自然湖泊的探索和思考 李跃龙 (161)

清末民初湖南人西医观的演变 李传斌 (169)

抗战时期湖南经济损失研究 萧栋梁 (180)

何绍基《西甌日记》(上) (清)何绍基撰 毛 健 段玉珍整理 (193)

琉球国使臣祭左宗棠文 韩洪泉整理 (206)

古代思想与哲学自觉

——评《胡寅历史政治哲学研究——以〈致堂读史管见〉为中心》 凌金良 (209)

附录 《湘学研究》总第三辑目录 (212)

【特稿】

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关于群众路线的几点认识

田培炎^{*}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能不能一以贯之地坚持好、与时俱进地运用好这个活的灵魂，始终是摆在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政治课题、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

一 注重向历史借智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把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作为党的全部工作的基础，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

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做群众工作的具体任务和要求。在大革命时期，党先后领导了早期工人运动、早期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做各界群众的工作，以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组成了浩浩荡荡的人民革命队伍，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在民主革命期间，党也犯过陈独秀只要资产阶级、不要工农大众，张国焘只重视工人运动、不重视农民运动，以及王明在抗战初期混淆阶级阵线等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土改、抗美援朝、恢复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又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历史任务，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依然用群众运动和“大民主”的方

^{*} 田培炎，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局长。

法进行党内斗争,教训是深刻的。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民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积极推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取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成就,无一不是相信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可以说,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形成并逐步深入人心的历史,是党的群众工作路线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党的群众工作反复探索、逐步深入、不断升华的历史。

能否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能否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在近代中国,一切资产阶级革命派均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清朝末年的“维新派”仅靠口诛笔伐,尽管一些人表现得很英勇,但最终只能发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叹。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岳王会乃至后来的同盟会等革命党人,仅仅倚重地下帮会和少数人的武装暴动,结果屡遭失败。孙中山一生革命40年,虽然赶走了中国最后的皇帝,但由于他和他领导的革命党人依然远离民众,所以最后还是革命夭折了,孙中山临终前才意识到“唤醒民众”的重要性。

在我们党内,早期共产党人如彭湃、邓中夏、张太雷等,也有过改换服饰、学说土语而设法融入工农的经历。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没有因此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反在党内忽视民众的错误路线几度占据统治地位。只有毛泽东同志通过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通过观察世界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通过总结现实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实践经验,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深入研究,才真正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不朽著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回顾了自己联系群众的感情经历。他说,当学生时,也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后“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①正是由于思想感情起了变化,才决定了他从秋收起义到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地搞群众运动,一生都与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要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自觉指导革命实践是不容易的。这需要经过以马克思主义彻底改造主观世界的艰难过程,需要经过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革命实践和感情培养的过程。

始终注重用科学理论宣传教育和组织引导群众,是我们党的突出特点和优势。党在成立初期,通过创办《新青年》、《劳动界》、《劳动音》、《工人周刊》、《湘江评论》等刊物,以及组织成立产业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农民协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向广大工人农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第二次理论飞跃——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这说明,科学的理论武装从来就是支撑一个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族、政党和国家长盛不衰的精神支柱。但是，撇开群众的切身利益而空洞地进行说教，是难以真正赢得群众的。我们党过去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搞土改、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后来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无一不是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做群众工作的。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群众的思想觉悟不会因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自然提高，只有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与重视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具有严密组织系统和铁的纪律的政党。党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组织建设，尤其重视把党的基层组织建成联系群众的坚强堡垒。正是依靠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党才能迅速而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群众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共同奋斗。但更为重要的是，群众拥护我们的党，是从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行动中，从无数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中，看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组织和动员群众，既要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更要发挥党员和干部的人格力量。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来自其本人的党性修养，来自党组织的严格训练和经常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打扫政治微生物”。

为了实现党的任务，必须紧紧依靠作为群众主体的工人、农民，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争取少数人的同情和支持，是我们党的一贯策略和方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把建立和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作为群众工作的重点，决定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小地主，孤立和打击大地主、土豪劣绅。抗战时期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总策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经验时，把统一战线作为三大法宝之一，其精神实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在依靠多数人的同时尽量团结和争取少数，正确处理“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努力寻找不同利益群体的“最大公约数”。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都蕴藏在群众的智慧与热情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经常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学习，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并对群众的意见加以分析综合后作出决策。同时也要看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迁就群众落后情绪、认为群众意见天然合理的“尾巴主义”，以及不顾群众意愿盲目蛮干的“命令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做群众工作的大敌。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组织和动员群众，在做群众的学生时要防止犯尾巴主义的错误；在做群众的先生时要防止犯命令主义的错误。

二 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鲜明特点

新的时代条件下，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所面对的服务对象——人民群众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群众工作呈现出与以往任何时候都完全不同的鲜明特点。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这些特点，是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前提。

社会阶层日益增多，群众工作对象更加多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显

著标志是社会阶层日益增多,社会分化日趋明显。不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而且新社会阶层正在迅速成长。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无地无业无稳定收入人群、因利益关联紧密聚集起来的特定利益人群,正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群体。不同阶层和群体就业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不同,利益诉求不尽相同,有时甚至相互对立。满足和服务不同阶层和群体的需求,需要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思路和方式方法。

服务群众内容不断拓展,利益矛盾更加突出。改善民生、帮扶困难群体、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对特殊人群进行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化解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正在丰富、拓展群众工作的内容和范围,其中绝大多数需求和矛盾都同利益问题紧密相关。河南新乡吴金印,这位从毛泽东时代起就一直担任公社(镇)党委书记的全国劳模,无疑对同时代的群众应该最了解,最有发言权,他感慨现在的群众同过去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是觉悟低了;二是把利益看得更重了。一位长期负责城镇拆迁工作的区县领导反映,现实中经常遇到的是,少数群众把拆迁当成不劳而获、牟取暴利、一夜暴富的绝佳机会,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人性中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蛮不讲理、六亲不认等恶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出现这种变化,既与市场经济伴随的趋利性引发整个社会更加看重物质利益有关,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引发人们的心理失衡相连,也与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害怕群众、迁就落后群众、试图通过花钱买平安来息事宁人等紧密相关。因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协调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途径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成为群众工作的重中之重。

舆论格局变化巨大,教育引导群众需要借助的手段更加多样。群众意见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群众觉悟也不会自发提高,用先进理论、先进文化教育引导群众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现在,主流媒体占据舆论主导的优势正在弱化,互联网、手机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正在快速上升,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扩大器,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丰富。在多元媒体影响社会舆论的条件下,人们的民主法治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公平公正意识、自主独立意识日益增强。如何教育引导群众,提高群众思想道德水平,既需要与人民群众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同吃、同住、同劳动等传统工作方法进行沟通交流,更有赖于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舆论、教育、协商等手段规范群众行为,提高群众觉悟。

党员干部“接地气”普遍不足,群众工作“本领恐慌”问题更加严重。现在,干部队伍来源单一、经历简单,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三门”干部,即使少数有过下基层挂职锻炼的经历,时间也十分短暂。许多干部既没有与工农群众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也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缺乏直接同群众打交道、应对复杂局面和矛盾的经验,缺乏群众感情,宗旨意识淡薄,不愿深入群众,不敢接触群众,不会和群众沟通,在群众面前往往处于“失语”状态,对群众愿望和社会矛盾掌握不及时、了解不准确。因此,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工作本领的任务更加紧迫而艰巨。

社会运行呈现“四高”特征,群众工作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当代中国社会呈现出高分化、高流动、高活性、高互动的鲜明特征。高分化,如上所述,社会阶层日益增多;高流动,

即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意识”流“五流”汇合；高活性，即社会热点问题燃点低、敏感度高，一些局部问题、个别矛盾、少数人的不满情绪，往往能够借助于网络等新兴媒体迅速放大、引爆；高互动，即各种矛盾容易在体制内外、党内党外、境内境外、网上网下之间交织互动，大大降低党和政府的工作成效。加上社会“仇官”心理滋长蔓延，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处处都出现“塔西佗陷阱”（意指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说假话、做坏事），群众工作面临的外部环境空前复杂。

三 最紧要的依然是观点立场感情方法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最根本的在于他始终心中装有人民、对人民始终充满真情厚谊；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理论力量，最根本的同样在于其中蕴含着鲜明的群众观点、坚定的群众立场、深厚的群众感情、丰富的群众工作方法。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中，体现到每一位共产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最紧要的依然是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掌握群众工作方法。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人类文明进步的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核心内容。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需要我们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始终坚持人民的地位最高、人民的力量最强、人民的智慧最大。古人讲：“乘众人之智，则无不成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创造新辉煌、谱写新篇章的不竭动力。党的一切施政活动都要着眼于保证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活力，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威力和智慧充分发掘出来。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最能发现问题，最能发明创造，最有发言权。当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党只是帮助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工具，共产党人只是人民群众之沧海一粟时，就会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以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胸怀，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的决心，扑下身子，拜群众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从亿万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开辟理论创新的源泉，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把握决策的正确方向，从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中寻找深化改革开放、破解发展难题的“金点子”、“妙法子”。

立场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时刻站稳人民立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帮助最大多数人追求最大幸福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一名领导干部，如果一事当前，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利害得失，首先照顾的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少数人或小团体的利益，那一定是没有前途，一定会失败的，这样的干部迟早是要摔跟头的。只有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办事，才不会出现大的偏差，即便工作中出现失误，

也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有了鲜明的牢不可破的人民立场,作决策、想问题、办事情就有了坐标,谋划发展,就能最大限度地让人民群众受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协调利益,就能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同时关心每个群体、每个个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就能勇敢面对、有效制止少数人的无理取闹;化解矛盾,就能高扬公平的旗帜,让人们在定纷止争中感受到公平的阳光雨露,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感情决定态度,态度影响行动。对人民群众怀抱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坚持群众路线才会有持久的动力。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即使你经常下基层,也难以听到真实的群众呼声,即使你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心里也想不到一块儿去。为什么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那么顽固地存在?为什么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屡屡发生?为什么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没有感情。这表明,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领导干部,都有一个培养群众感情、增进群众感情、保持群众感情的政治任务。为此,首先需要牢记共产党人来自群众,只是群众中的普通一员,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要始终保持赤诚之心、赤子之心,始终保持人民群众的本色,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做到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困,我之所虑。另外,应当学会换位思考、换位体验、换位感悟,将心比心,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多听听群众的冷言冷语、尖锐批评,多问一问群众的烦心事、恼火事,从中获得真情实感、真情绪、真忧苦,判断什么事应当办,什么事不能办,什么是当务之急,什么事应当暂缓,在群众企盼中把握工作重点,从群众意愿中权衡政策利弊,做到作决策不忽略民智、办实事不违背民意、做好事不超越民力。

掌握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对坚持群众路线能否取得成效至关重要。应针对不同群体的具体特点和要求,积极探索服务群众的方法和途径,不断增强群众工作的实效。现在,收集了解民意民情的渠道增多了,联系群众的手段先进了,上传下达的速度快捷了,这无疑是我们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利条件,应当运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先进技术手段联系和服务群众。同时,我们党深入群众的许多好传统、好方法具有普遍价值,永远不会过时,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光大。换句话说,无论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能取代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面对面、心贴心的直接接触,亲力亲为,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对这些好的传统方法,还应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比如,深入基层搞研究,除了正式组织安排的以外,还可以多做一些不打招呼的调研,多搞一些明察暗访、微服私访,那样往往能够获得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离不开基层的大胆创造。这些年来,各地在做群众工作中创造了许多好方法,需要我们认真总结、提炼推广,及时把好的方法制度化、好的经验长效化。比如,一些地方创造的“一线工作法”,即“领导在一线指挥,决策在一线落实,矛盾在一线化解,工作在一线对接,干部在一线锻炼,能力在一线提高,成绩在一线检验”,成为推动工作落实、提高工作效率、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方法。

(责任编辑:毛健)

《濂溪志》与当代社会人文精神简析

王晚霞*

摘要：对八种《濂溪志》版本进行整理校注的《濂溪志（八种汇编）》内容丰富，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宋元明清四代人对周敦颐思想的诠释和歌咏，在继承先哲思想、宣传地方名人、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意义，也具有地方志修撰的一般意义。更重要的是，该书是弘扬濂溪精神的重要载体，启发当代人安道养心以寡欲、安贫廉洁以自律、深怀感恩以爱人，治修礼法、尚学好贤，对丰富和校正当代社会人文精神很有价值。

关键词：《濂溪志（八种汇编）》；濂溪学；周敦颐

一 《濂溪志》的版本及主要内容

（一）版本简介

1. 鲁承恩版《濂溪志》

此本目前国内无存。为“嘉靖庚子严陵鲁承恩同知本府刻”，编修时间始于嘉靖己亥孟冬，续成于嘉靖庚子季秋。据载，该本校者为“同寅渭北赵公儒，乡彦石北朱子衮”，刊刻者为周子裔孙五经博士绣麟。另外得“同官于是郡者寮属计若干人，生长于是邦者，缙绅韦布之士，共若干人”之助。

2. 胥从化版《濂溪志》

此本修订于明朝万历岁癸巳（1593）孟秋之望，由时任永明县（今永州市江永县）知县胥从化编订，由道州儒学署学正事举人谢颉编校，训导刘报国同校。此本共十卷，目前仅存六卷。

3. 李桢版《濂溪志》

* 王晚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此本修订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冬十月,由时任“赐进士第嘉议大夫、户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协理院事、左副都御史、北地李桢”刻印,当时李桢正“镇抚三楚”。此本共九卷全。

4. 周沈珂、周之翰版《周元公世系遗芳集》

周沈珂、周之翰父子为周子后裔,此本刻印于明朝万历丙辰年(1616)仲冬,共五卷全。此本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86》有存,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万历刻本。

5. 李崱慈版《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

此书书名为:“春陵拙吏龙城后学航普李崱慈元颖父纂修”,刻印于明朝天启四年(1624),共十三卷全。

6. 吴大镛版《道光元公濂溪周夫子志》

此本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印,凝翠轩藏版,由三韩知道州事吴大镛、吴重鼎先生主修。同修者为:道州判丁士达,号德卿,京口人;儒学学正王遵度,号次同,齐安人。参订者为:儒学训导石国纶,号颢章,鄂城人。督刻者为:道州吏目张成福,号获社,博陵人。校正者为:郡人后学,何大晋,号退然;许魁,字介五。同校者为:何鸣凤,字梧生;陈龙飞,字际五;陈宣,字广化;何友兰,字芳若;编次者为:常在,字云石。此本共十四卷全。

7. 周诒版《濂溪志》

此本刻印于清道光己亥年(1839),爱莲堂藏版。此本七卷全。

8. 周诒版《濂溪遗芳集》

此本遗芳集作者与上述《濂溪志》同,刻于清道光己亥年(1839),现存二卷,据底本看,内容不全,有遗失。

9. 彭玉麟版《希贤录》

此本署名为“衡阳后学彭玉麟谨辑,桐城存之方宗诚、善化麓樵胡传钊分校,芷江与吾李成谋、益阳燕山丁义方合刊”。刻于光绪九年(1883),共二卷全。

其中《濂溪志(八种汇编)》(以下简称《濂溪志》)中整理的是后面八种。

(二) 主要内容

1. 历代题咏

这部分内容最多,从体裁上看,主要是祭奠诗、文、赋、铭。从主题上看,主要是对周子的祭祀、对周子遗迹的拜谒、在相关地方的交游、对周子的忆念、阐发周子思想的哲理、与周子的赠和。这些诗文的作者大多是湖南、江西的地方官员,也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国内官员,还有一些作者是周子后裔。从诗文产生的地点来看,有在祠前、墓前、故居前、书院前、遗迹前。从产生的类型看,有在祭祀中、在游览中、在读书中、在思考中。从诗文的目的是来看,有发挥、传播濂学思想,抒发感慨,也有不少是希望受到思想上的启发和指导的。

2. 濂溪祠堂记

随着周敦颐在思想史上地位的不断提高、理学思潮的兴盛和统治者关于祠堂制度的改变等,从南宋开始出现濂溪祠堂,明清时期,对濂溪祠堂的修缮各地一直都在进行。濂溪祠堂的

地点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六地，约四十处，修建者主要是地方官员。这些祠堂都经过多次修建、毁坏、再修缮和修建的过程，每次修建、修缮，基本都有祠记，《濂溪志》是周敦颐可见研究资料中保留最为完整的。

3. 濂溪书院记

周敦颐曾在四川合州，广东广州，江西赣州，湖南省永州、郴州、邵阳任职，其间他重视教育，兴办学校，留名一方。随着他在理学史上地位的提高，据我们统计，仅湖南省就曾有十七个区县建有濂溪书院，其中永州市有道县、零陵、永州府、东安、江永、新田、蓝山、江华、宁远濂溪书院；郴州市有郴州、桂阳、桂东、永兴县濂溪书院。另有衡阳市濂溪书院、邵阳市濂溪书堂、希濂书院、邵阳县爱莲书院、娄底新化县濂溪书院。这些书院的修建，部分有记，《濂溪志》中也有收录，是周子教育思想的回音，也是周子思想传播的渠道之一。

4. 诸儒杂论

这部分主要是节选周子之后，各理学明贤对周子思想的诠释和阐发，从字数上看并不多，但却非常重要，这是周子思想发展的重要轨迹。《濂溪志》中对此有部分收录，应该并不全面。

5. 志集序跋

以各种形式来整理周子的思想，是宋以后的人一直都在做的。修撰各种形式的周敦颐集，其序跋是对修撰的重要说明，也是后人考察其志集修撰的依据。目前所见的周子志集序跋主要是：方琼《濂溪遗芳集序》，黄佐《道源书院集序》，王会《濂溪集序》，鲁承恩《濂溪志序》，丁懋儒《刻濂溪周元公集序》，胡直《刻濂溪先生文集序》，林山《刻濂溪集后跋》，王汝宾《刻濂溪集跋》，宋圭《重刻濂溪集跋》，侯廷训《道源书院集说》，李桢《刻周先生志序》，吴大谔《濂溪先生志序》、《濂溪志后序》，李崱慈《濂溪周元公志序》，周浩《重修濂溪志跋后》。这些序跋，体现了《濂溪志》修撰的历史轨迹，也是考察周子思想流传的依据之一。

6. 官方褒崇

周子思想能在后世影响深远，其间也有一个高低起伏的过程，在官府提倡褒扬时，地方上也会兴起对周子的各种宣扬，在官府冷漠不理时，地方百姓也会了无声息。这些官府的褒扬和崇奉，都是有据可资的，主要体现为皇上的各种册封，基本完整地保留在《濂溪志》里。

例如：宋宁宗嘉定十三年，赐谥曰“元”；宋理宗淳祐元年，诏“从祀庙庭”，寻追封“汝南伯”；元仁宗延祐六年，加封“道国公”；明英宗正统元年，诏“修祠墓、优恤子孙”；明武宗正德元年，崇祀元公于九江书院；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以元公父谏议大夫辅成从祀启圣祠；国朝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祀升先贤周子于阙里庙庭、天下学宫；顺治十年，议授先贤周子后裔周莲世袭“五经博士”奉道州祀；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康熙五十八年，以先贤周子后裔周枚承袭“五经博士”等。

7. 周子后裔

主要内容一是官府对周子后裔的体恤、优待的具体情况，历朝历代的、来自皇上的、地方官员的，都有政策体现。二是周子后裔的生平事迹情况，这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在彭玉麟版的《希贤录》中，是了解周子后裔情况的重要资料。

二 《濂溪志》修撰的意义

以地方志的形式来记录一个人的思想,这对于周敦颐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自己的著作不多,而影响又深远,在地域上的影响遍布全国,各地理学明贤以及慕名前来的瞻仰者,均对周子极力颂扬,《濂溪志》中均对此有收录。并且附有周子画像、太极图、濂溪故里、月岩、祠堂等相关图像,既是志体的特色,也增加了后人了解周敦颐的直观感受,是名人志传中不多见的。从明代开始,就陆续有人在修撰《濂溪志》,目前国内尚无一个比较全面的版本,鉴于周敦颐思想的重要性和可资研究的资料缺乏,我们历经六年多时间,整理了这部古籍。这在各个方面都很有意义。

(一) 记录周敦颐思想流播的轨迹,也是对先哲思想的继承和传播

“窃计欲正人心,当明道术,欲明道术,当崇真儒。”^①周敦颐是真儒的典型,周子自己的作品在后世的流传情况,我们可以从《濂溪志》中见到,也可以在其中清晰地看到各级、各时的文人墨客歌咏周敦颐的各类诗文,这是周子思想流传的轨迹,也是考察周子思想演变的重要资料。此外,《濂溪志》中记录了其他众多人的诗文作品,虽说是围绕周子立意取象,但也是其本人思想的体现,这些思想也很有价值,值得我们思索和学习。

(二) 宣传地方贤人,推动经济发展

周敦颐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人物,在宋明理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当代社会中,对如此重要的人物的宣传,不仅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等学术意义,更具有推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意义。将地方文化名人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以此树立经济增长点,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宣扬周敦颐,对于发展道县、永州以至湖南省的经济,都很有意义。

(三) 为濂溪精神的发扬提供良好的载体

目前国内也有各种周敦颐的研究著作,如梁绍辉先生的《周敦颐评传》、《太极图说通书义解》,周忠生先生的《道学宗师周敦颐》,毛宽伟先生的《周濂溪学说发微》,杨柱才先生的《道学宗主——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陈郁夫先生的《周敦颐》,王立新先生的《理学开山周敦颐》,彭达池先生的《大家精要周敦颐》,等等。也有几部周敦颐集,如梁绍辉、徐荪铭等先生点校的《周敦颐集》,陈克明先生点校的《周敦颐集》,谭松林、尹红整理的《周敦颐集》,湖南省濂溪学研究所整理的《元公周濂溪先生集》,范立舟的《周敦颐》,周文英、李才栋主编的《周敦颐全书》等,都对周敦颐的作品以及后人与之相关的作品进行了整理。以上著作,当然都非常有价值。

《濂溪志》不是研究类著作,价值也在文献资料上,相对以上周敦颐集一类整理作品来说,

^① (明)李桢:《濂溪志·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第195页。本文所引《濂溪志》,均出自王晚霞校注《濂溪志(八种汇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不再注明。

《濂溪志》的资料收集和保存是最全面的，会给研究者提供很多方便，不仅为濂溪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文献资料方面的平台，而且为濂溪精神的传播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物质载体。

三 《濂溪志》对当代社会人文精神建设的价值

先哲的思想，在历代的不断诠释中，会变得深刻细致，也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濂溪志》中保存了大量历代围绕周敦颐而作的诗文，其中绝大多数都从各个侧面，或深或浅地对周子思想进行诠释。这些思想值得历代后人继承，“乃有司与诸生或假设、剽猎，不能究心先生之学，而徒以俎豆事先生，则不惟无政与教，且先生辱矣”^①。因为周子光辉的思想贯通天地，“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②。可超越时间之限，假如“人心可亡，则先生之道亦可亡也；天理可灭，则先生之道亦可灭也。苟人心天理无容亡灭，则学者修其辞，明其道，百世以俟圣人可矣”^③。所以，这些深化和细化了的濂溪思想，对当代社会的人文精神建设，依然值得借鉴，给人启发。

（一）安道养心以寡欲

周子在《通书》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观：“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自己认为贵的，自然会去趋之；认为富的，自然会去附之；认为不贵不富的，自己不会为之耗费心神。在周子看来，道的充实是最贵的，身的安定是最富的，有此二者，则时时都是吉祥安泰的，再也没有什么不满足了；虚名和财利，则是非常渺小轻微不必在意的。对此，朱子解释说：“内重而外轻，则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荣。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诱矣。”已经有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即为道，也心安于此，则不会为外在世界中的人爵之荣诱惑。

心安于道，并以道养心，方法正如周子在《养心亭说》中言：“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人若能如此，则“善学先生者，自当有恬淡真味”^④。这种恬淡正是欲寡的外在体现，这种真味正是内在道充的状态。

当代社会中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去追逐名利的现象层出不穷，如果大家能够稍如周子所言以道充身安为贵，看轻轩冕金玉，许多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事情就都会避免。若能抽空阅读和思考周子之思想，“读先生之书赋，求先生之心真，积力久，希圣希贤，必有得颜子之所乐者矣”^⑤。“能日究先生阴阳、动静之旨归，缅想先生光风霁月之气象，优游汲咏，溯流寻源，于以明乎天地之所以覆载，万物之所以并育，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愚不肖之所以为愚不肖，与夫

①（明）赵贤：《永明县仰濂祠记》，载胥从化《濂溪志》，第63页。

②（宋）朱熹：《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淳熙六年）》，载胥从化《濂溪志》，第77页。

③（宋）郭见义：《南安初建三先生祠记（乾道元年）》，载胥从化《濂溪志》，第70页。

④（明）李桢：《新置濂溪先生祭田记》，载胥从化《濂溪志》，第59页。

⑤（宋）张栻：《永州府学先生祠记》，载胥从化《濂溪志》，第64页。